

同盟会栖霞四君子之一李凤梧

□张荣起

李凤梧、谢鸿焘、宋钟尧、于洪起被称为“同盟会栖霞四君子”。他们在辛亥革命烟台起义中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近几年经过对四君子事迹的全面调查和考证，有了新的发现和收获，尤其是关于李凤梧的史料，有了新的突破。近期，在李凤梧的故里栖霞市泽头村，在党支部书记李金海的引荐下，我们与李凤梧的孙辈李忠、李仁、李惠民、李孝、李辉等知情人一起召开了座谈会，查阅了李氏宗谱，瞻观了李凤梧故居与陵墓，随后整理成文，供关注李凤梧事迹的读者参考。



李凤梧日本留学时的照片。

农家子愤世嫉俗寻求救国路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被迫开通了五座城市为通商口岸，动摇了满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之策，让已步入资本主义的外国人闯入中国自由贸易。不久，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各国瓜分的危机。1861年，烟台也在山东首先被迫开埠，17个国家先后蜂拥而入。沉睡的中国人民终于被惊醒，“反封建、图自强、学科学、倡民主”之类的呼声此起彼伏，不仅震动了城市，也波及到山乡栖霞唐家泊镇泽头村。

生于泽头村的李凤梧自幼胆识过人，行侠仗义，敢发议论。“清制不革，中华不兴”这句话，他常挂在嘴上。面对满清政府丧权辱国、屈膝媚外的国策，李凤梧怒火燃烧，常以“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来抒发抱负。一日，他与赶牲口的同伴行于途中，又议起“清廷腐败，国亡无日”的国事，李凤梧又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大丈夫岂能老为人执鞭，只图一家一室之温饱！请你等将我的牲口带回，我要考洋学堂、寻求救国救民的路去。”从此李凤梧离家到了登州，后中秀才，得官费东渡日本，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。一次学校组织参观日本侵华战利品展览，李凤梧暗下决心：“不雪此耻，誓不罢休。”适逢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，李凤梧在洪起的引荐下，很快认识了谢洪焘、马肃贞夫妇、宋钟尧及黄县籍的徐镜心等胶东优秀学子，并同期加入了同盟会。自此他心明眼亮，动力倍增，矢志“以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为己任”。除在校专攻警政外，还积极参加校外的各种集会、编译书刊等社团活动。1905年底，谢洪焘、马肃贞夫妇因不满校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理限制，应秋瑾的呼吁提前回国，李凤梧为寻求强国之道，留校继续学习，有时也往来于日本、烟台之间，联络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及有识之士，鼓动反清宣传活动。

烟台举义，舍身忘我摧枯拉朽

1907年，李凤梧在日本学成回国，立马投身于反清革命舆论工作。翌年，他在烟台与同盟会好友丁训初、齐甫南等合伙创办了《渤海日报》，并以报纸作平台，秘密作“推翻满清腐朽统治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”的宣传。其时，先期回国的同盟会会员谢洪焘、马肃贞夫妇等创建的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正办得风生水起，以两校为联络点，全国各地的同盟会会员穿梭般地出入烟台，李凤梧也到东牟公学兼课，传授警察知识。谢洪焘等同盟会员则借《渤海日报》的平台，发表针砭时弊、鼓吹革命的文章，当时两校一报在北方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但好景不长，由于两校的目标太大，很快被清廷所注意，“缉拿乱党，惩办首恶”的阴风四起，谢洪焘被迫携妻女外逃避难，《渤海日报》也只能转入地下，秘密发挥作用。

1911年10月10日夜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李凤梧应同盟会之命，与宋钟尧、丁训初、王耀东、杨新亭、宫锡恩等在《渤海日报》馆一起密谋烟台举义方略，并与清政府驻烟台的陆、海军警中的同盟会员、同情革命者秘密联系，约定举义时间、做好相关准备。1911年11月12日，在烟台会人员及支持革命的各界人士，齐集毓璜顶东路的百货商店（谢洪焘所创密活动点），推举宋钟尧与杨锡盛为正副指挥，约定鸣枪为号，当晚10时整，各操自备武器，无器可操者，就以布缠管等秘密地装上匣子枪、茶杯、苹果裹布充手雷，蜂拥而下，直扑道署衙门审判庭，高举火把，联络内应。宫锡德、宫树藻等见火起，即出迎革命党人。革命党人进入海防营，迫使董宝泰率部响应革命。接着起义军兵分五路，分头向道署、衙门、电报局、邮政局和大清银行进攻。书有“同胞速举义旗，帮助民



李凤梧与苏氏在故居合影。

逐出满清”的彩色传单满天飞，口号声、在铁桶里燃放的鞭炮声震天，道台、衙门总办闻风而逃，五处很快被起义军占领。其余清军头领逃亡的逃亡，倒戈的倒戈，海军练勇营及水师学堂也顺应形势响应革命，一夜之间，举义告捷。

义军又西进福山县城，旋即光复。为防止济南方向的清军驰援，1912年1月，宋钟尧、李凤梧等又组织起30余人的精干队伍，攻打登州与黄县。在攻打黄县城遇阻后，又以率先起义的十八勇士为骨干，组成精锐小分队。李凤梧任小队长，他英勇争先，奋力拼杀，打开了城东门。之后，李凤梧、宋钟尧、丁训初、王耀东、杨新亭、宫锡德、肖生仁、孙锡纯被称为“八大金刚”。

烟台辛亥革命，举义快，伤亡少，战绩显赫，名声远播。然而，由于经验不足，虽然在烟台摧毁了满清政权，却被迫自天津赶来的“舞凤”号军舰带王传信所欺骗，推其做了临时军政府司。王传信掌权后，倒行逆施，差点葬送了革命成果。革命党人遂推宋钟尧等赴上海求援。关键时刻，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回到烟台，凝聚了众心，上海又派胡瑛北上为山东大都督，正式成立烟台军政府，李凤梧被任命为财务司司长，后改派驻坊子外交特派员。

遭通缉，涉危历险终圆夙梦

正当形势大好之际，1912年3月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，登上民国大总统。1913年，袁世凯悍然发动政变，到处捕杀革命党人，烟台陷入乌云笼罩之中，到处张贴“凡捕一名革命党人，一两人肉奖一两白银”的榜文，清政府的顽固势力也死灰复燃，大搞复清拥袁活动，致使革命陷入低潮。李凤梧受沪督陈其美之委托，赴河南组织讨袁。他行化成客商模样，却被袁世凯的暗探识破了。为了甩掉暗探，他行经青岛，躲进日本人经营的大粮店，机智地用日语与女老板交流，老板会意，巧妙地将他装进粮包，推进粮库，躲过了五位追兵的搜查，得以保住性命。第二天，李凤梧在女老板的帮助下，办了赴大连的船票，扮作死尸卷在席筒中，由雇工拉出了警戒森严的中山路，直奔大港码头。码头到处是密探、巡警与大兵，李凤梧发现有人跟踪，立马抓起一把煤灰，擦了擦脸，伪装成船夫，大摇大摆地上了客船，躲开了第三次检查。一声汽笛长鸣，客轮起航，追兵被甩在了码头上，李凤梧再一次脱险。

大连同样笼罩在腥风血雨中。在死亡线上奔波的李凤梧流落街头，一度以乞讨度日，饿极之时，吃过破棉花，吞过旧被褥。两年后，忽有李凤梧饿死大连的消息传回家乡，他的四弟李绍荣立马乘帆船，颠簸了五天四夜，到大连拜访登州老乡，终于找到线索。兄弟见面，抱头痛哭了一番。李凤梧说：“袁世凯很快就会灭亡，出头之日不远了。”李绍荣回



家卖了一亩地，把钱寄到大连，使李凤梧与妻子苏氏渡过了难关。

1916年6月，袁世凯死了，革命形势峰回路转，李凤梧被调回南京，派到禹城当了两年县长。他尽职尽责，肃匪灭盗，招回外流百姓，维持社会治安，百业复兴，受到百姓的爱戴。1918年复回南京，进民国高等学府深造。1919年，北平爆发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他挺身而出，积极发动南京师生，声援北平爱国运动。1920年李凤梧结束学业，重回烟台，除继续以报社为平台联络各县爱国志士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政策外，更关心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，发现因战乱、饥饿，许多孤儿无人抚养，便出面建立起恤养机构——广仁堂，自任堂长。1922年，某教会学校学生因参加爱国学潮被学校开除，纷纷求助李凤梧。李凤梧说：“外国人能在中国办学，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办自己的学校？”于是创办了先志中学，自任校长，接纳了被开除的学生。因经费不足，他曾回家卖掉继父分给自己的5亩土地。1924年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后，李凤梧又奉调回南京，出任国民政府秘书长。李凤梧有胆识、有担当，供职期间恪尽职守，抗御外侮，抵制洋货，尤其标有日、德、英的洋字百货，严加审理。遇到鸦片商，立即配合警方没收、查办，毫不姑息。为此，他得罪不少人，也作出不少牺牲。1933年，李凤梧积劳成疾，因高血压引起中风，经国民政府批准，回老家泽头村调养。

晚年负恙，依然关注家国事

李凤梧居家休养期间，仍与烟台老同盟会会员保持密切联系，友情不减当年，是乡间德高望重的人物。每当政局有变，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，李凤梧从不卖老，诚恳接待。晚年，蒋介石一系列的反共、反人民活动，他不堪忍受，严加揭露批判。1934年前后，莱阳县中共党员梁岐山随其兄梁凤山到栖霞唐家泊、泽头村一带，以打短工为名开展党的地下活动，在周边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。不久，风声暴露，国民党地方组织实行清乡，逮捕了好多党员和进步青年，李凤梧得知后，带病坐船进城，会晤县长朱景文，提出与他一起提审、过堂。他让在押人员一一伸手，见个个满手老茧，转身对朱景文说：“你看不到没有，他们明明是出苦力的庄稼汉子，怎么能是共产党员？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，大知识分子，他们才深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，这些大老粗懂得这些吗？”朱景文频频点头，当天将在押的9人全部释放回家了。

1936年农历9月9日10时40分，李凤梧病危，经过医治无效，与世长辞，享年69岁，暂厝于泽头村北李氏老茔。殡葬期间，南京行政院、山东省政府主席、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众多部门或名流，均有唁电、挽联或来吊唁，并拨来800银元作殡葬费。

李凤梧先后娶妻、苏房两妻子，均未留下一男半女，年近半百，收留东孙家村一个自幼失去父母、受人虐待的14岁少女孙云为养女，取名李天真，视若己出。根据传统习惯，过继四弟李绍荣之子李天志为嗣子。李凤梧用左手执笔书写的过继单，见过的晚辈至今还依稀记得其大概：“吾奔走革命四十余载，屡罹祸患，每当危急时，均有胞弟绍荣挺身而出，救急于一悬。故将部分财产（房屋、土地数目）过继到绍荣长子李天志名下，日后如有不服者，可令吾妻苏氏令图携吾子得志持此据到当地政府评理。立据人 李凤梧（章） 经办人 于洪起 李恒久”。正是这份过继单，使晚辈们知道他们这位苏氏奶奶的名字为苏令阁。

李凤梧晚年由苏氏陪伴左右。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胶东，因家藏共产党员牟福乐戴大红花的照片，被还乡团所迫，苏氏到李凤梧墓前喝药自尽。

“当，当，当……”生产队的“点”声一响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几乎同时从一座座农房里走出，成群结队地涌向村里的那棵歪脖子柳树下，等待队长分配农活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，这样的场景，在胶东农村是到处都能见到的。

那时，农村经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，社员统一上工。一个生产队少则二三十户，多则五六十户，住房不是很集中，招呼社员同时上工靠什么？靠“打点”。“点”声就是召唤、就是命令，社员对它的认可度，就像是战士听到出征的号角似的，闻声而动，不敢懈怠。

“点”是铁制的响器，挂起来敲，用来报告时间或召集群众。我们生产队的“点”，吊在一棵一搂粗的柳树上面。上顶直径约二十厘米，下口直径约四十厘米，中空深约三十厘米。中央有一两头尖的椭圆形铁锤，系在绳子上，绳儿一拉，锤敲钟壁，发出声音，传播四方。

生产队的“点”不是随便敲的，得队长或副队长才有这个权力，一般社员不是发生极特殊情况是不能染指的。

听的回数多了，社员们都能从点声的节奏中分辨出用意，就像当兵的人辨识军号一样。

听到“当，当，当”，悠扬舒缓的“点”声，社员们知道是要上工了，赶紧撂下碗筷儿，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从自家扛上铁锨、镢头，或是拎着水桶什么的，到“点”下坐着等待。最先到达的，往往是队长，他敲过“点”，便开始计划农活分配，谁干什么，拿什么农具，都得考虑周全，避免窝工。我十二岁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因为家中人口多，年年都是“欠款户”，母亲就让我早晨上学前、星期天到生产队干活，每天挣四分半。慢慢的，我也熟悉了生产队的“点”声，知道它与学校钟声的区别。等人大概到齐了，队长站到土堆上，开始点名分配营生，并指定领头人，交代干活的标准。一切安排妥当，社员们纷纷行动。只有树上的“点”，孤零零地吊在那儿，惯着秋月春风，无言地见证岁月流逝和农人生活的艰辛不易。

听到“当当，当当”，清脆短促的“点”声，社员们知道不是队里分草、分粮食，就是召开社员大会。那时社员家烧的草、吃的粮食，都要靠生产队按人口和工分分配。特别是麦收、秋收两季，生产队经常分草、分粮。草和小麦、玉米等，一般在场院里分，过好秤放到地上，会计在草堆上放一个写有户主姓名的纸条，或在粮食堆旁的地面上，用粉笔写着户主的姓名。分草、分粮一般在接近中午或傍晚的时候完成，“点”声一响，收回回家的人纷纷出来，在走完工路上的人则加快脚步，一齐来到场院，大人肩挑，孩子背，妇女两人抬，不大会儿工夫，场院里就清空了。最怕的是分地瓜，地瓜大都是在地里分，地远的离家四五十里，家里有小推车的，拿的就快些，我们这些没有小推车的家庭，得等别人拿完了，去借车用。等我们家把地瓜拿回家，常常是晚上八九点钟，饭还没顾得上吃呢。

那时，生产队开会多，政治学习、传达上级文件、开展忆苦思甜活动、年终决算等等，都要开社员大会。这时，男人或蹲着或坐着吧嗒吧嗒抽旱烟，妇女坐在小板凳上掐草辫或纳鞋底儿。牛屋里，劣质烟味混杂着牛粪味，熏得人喘不过气。散了会，问起开的什么会，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。

听到“当当当当当”，急促慌乱的“点”声，不外乎是三种情况：一是春天抢土墼。清明后，麦收前，天气多风少雨，是农村脱土墼的最佳季节。土墼至少得晒上三四天，才能成为建筑材料，盖屋垒墙。这期间，最怕的是遇上阴雨天。如果被雨水一泡，脱出的土墼就成了稀泥，先前的劳动就算是白费了。天一下雨，即使是半夜三更，生产队的“点”声也会“当当当”急促地响起，大人孩子都要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，冲向场院“抢墼”，垛成一垛一垛的，用塑料布或山草苫起来。

再是夏天抢场院里晒着的小麦。小麦脱粒后，先要晒干扬净，才能送公粮或分给社员。打完场，把麦粒摊开暴晒。场院打场的妇女，地里割麦的男壮劳力，都疲惫地回家睡个午觉。这时，天空忽然黑云堆集，电闪雷鸣，一场大雨即将到来。生产队的“点”声急促地响起，钟声裹挟着人们“抢场啦，抢场啦”的呼喊声，在大街小巷流淌。从来没见过人们这么着急，蜂拥似的跑向场院。不用谁动员，也不用命令，先到的先干，抡起刮板、木锨、扫帚，将满场院的麦粒收成堆。会计、保管拿来了麻袋、布袋、编织袋；孩子撑开袋口，妇女拿起铁簸箕，将麦粒装进袋里；男劳力有的两人用扁担抬，没有扁担的，一人抓住麻袋口的一个角，将麻袋上下反过来，一手抓牢袋口，一手抓住另一个人的一只手托住麻袋中央，两人喊着“一二三”，一齐用力，提起满袋的小麦，一溜烟儿跑向仓库。没人叫苦，没人喊累，等满场院的粮食抢进仓库，他们才累得瘫倒在地，身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。

还有社员家房屋着火。一个夏日中午，王奶奶家给孩子过满月，天热气燥，她家的老房子失火了。王奶奶家距离“点”近，她边招呼家里人救火，边飞快地跑出去打点，“当当当当当”，人们不知道发生了啥紧急情况，都埋怨敲钟人。队长王伯因队里要买牲口，那天正在家里跟经纪人喝酒。王伯是个好酒之人，听到“点”声没了喝酒兴趣，窝了一肚子火，就噌噌地出门看谁敢如此大胆地敲“点”。当听说是王奶奶家失火了，赶紧张罗人去救火，火气也瞬间消了，嘴里念叨着：麦上场，火烧房，这样敲“点”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
生产队的“点”声，虽然已经消失近四十年了，但那悠扬舒缓，或短促高亢，或急促慌乱的声音，时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……



(资料图)